

論蘇慧霜楚辭研究的成就與特色

陳亮* 陳曉童

摘 要

蘇慧霜教授治騷二十餘年，出版了《二南與屈賦》、《騷體的發展與演變--從漢到唐的觀察》、《楚騷魂--屈宋辭賦的抒情精神與生命美學》、《宋代騷雅詞論》等四部楚辭研究專著。這四部書將楚辭文體自下而上追溯到《詩經》，又自上而下追蹤到漢唐、兩宋，加上本體研究，形成了一個體大思深的研究系列。蘇教授的楚辭研究具有三個顯著特徵：第一，跨越學科，契合通融。即不拘泥於單一的研究視角，善於打破學科之間的隔閡，達到了融會貫通的境界。第二，宏微並用，以意逆志。將微觀的細節探索與宏觀的整體把握有機地結合起來，在對楚辭本體作深入的分析 and 細膩的探索基礎上，將研究結果上升到理論高度。第三，追源溯流，辨異析同。採用順流而下的方式，從《詩經》開始，進而至屈賦、宋玉賦，進而至騷體從漢至唐的發展衍變，進而至宋代的騷雅詞，通過探尋、分析、歸納它們之間的相同點與不同點，揭示文學發展的歷程與規律。總而言之，她堅持「整體審視、持之有故、言之有據、信而有證」的治學原則，綜合運用宏微結合、追源溯流、學科交叉等多種研究方法，在力求全面掌握資料的基礎上進行具體的分析論證，多角度發微燭幽，從而對以屈宋為代表的楚辭作品及其淵源、衍變、影響作扎實細膩的探究，展現出獨具特色的學術風格。

關鍵詞：蘇慧霜，楚辭本體，騷體衍變

一、前言

蘇慧霜，台灣台南縣人，東海大學中國文學博士，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教授。她曾師從李立信、李威熊、黃忠慎諸先生，以楚辭學為方向完成了碩士、博士學位論文，現已出版了《二南與屈賦》、《騷體的發展與演變--從漢到唐的觀察》、《楚騷魂--屈宋辭賦的抒情精神與生命美學》、《宋代騷雅詞論》、《阿里山詩集》、《阿里山文學誌》、《華人社會與文化》、《文學與人生》等著作，發表學術論文數十篇。

楚辭學是蘇慧霜所確立的主要研究方向。對於這個深邃的世界，她開始

基金項目：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(13&ZD112)、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(15CZW012)、江蘇省社科基金項目(13ZWC014)

* 南通大學楚辭研究中心，江蘇 南通 226019

也遲遲未敢探入。直到 2000 年 5 月，她隨導師李立信先生參加由北京大學與香港中文大學主辦的「屈原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」，在大師雲集的會議堂上，褚斌杰、吳宏一等多位先生的精研深辯與翩然風采，令她有「滿堂兮美人，忽獨與余兮目成」之感，從此便「一頭認真栽入楚辭的研究之中」¹。經過多年努力，蘇慧霜已出版四部楚辭學著作，發表幾十篇論文。其實，蘇慧霜研究楚辭的歷程還可以向前追溯。1992 年她已經在逢甲大學完成了碩士學位論文《二〈南〉與屈賦比較研究》，距今已有二十多年了。《二南與屈賦》(文津出版社，2009)就是根據她的碩士學位論文修訂而成的。該書就二《南》與屈賦進行比較考察，從歷史、文化、地理、語言、音樂、思想、詩歌形式與發展的軌跡，探尋二者間的脈絡源流。劉石林先生評價此書「以廣闊的視野，入微的觀照，精辟的分析和新穎的角度，全面解讀了二《南》與《屈賦》的異同和特色，讀後使人耳目一新」²。《騷體的發展與演變--從漢到唐的觀察》(文津出版社，2007)是根據她的博士學位論文修訂而成。該書從屈宋作品的形式、題材、意象以及影響等角度，探討從兩漢到唐代騷體文學衍變與發展軌跡。李立信先生稱之為「目光銳利，頗能發人所未發」³。《楚騷魂--屈宋辭賦的抒情精神與生命美學》(文津出版社，2015)針對屈宋詩學的主題內涵與抒情精神，發掘精義，掌握屈原、宋玉關於抒情與美學的旨趣與意義。《宋代騷雅詞論》(文津出版社，2011)一書則對宋代「騷雅詞」產生的時代文化背景，詞評理論和詞家作品作考察與探究，發掘騷雅詞在詞史發展中具有意義。毛慶先生評介道：「著者既治楚辭，又懂宋詞，對楚辭、宋詞二者之關係，常能發獨到之見，於人頗有啟迪。」⁴這四部著作將楚辭文體自下而上追溯到《詩經》，又自上而下追蹤到漢唐、兩宋，加上本體研究，形成了一個體大思深的研究系列。

蘇教授的論文著作，洋洋灑灑數百萬言，旁徵博引，娓娓道來，抽絲剝繭，舉重若輕，其研究文學史的視角既淵源有自，又能另闢蹊徑。我們認為，

¹ 蘇慧霜：《騷體的發展與演變--從漢到唐的觀察》(台北：文津出版社，2007 年)，頁 3。

² 劉石林：〈慧眼拾驪珠，霜寒孕梅香--蘇慧霜楚辭研究簡述〉，《華人論壇》(長沙：華人論壇雜誌社，2010 年)，頁 15。

³ 蘇慧霜：《騷體的發展與演變--從漢到唐的觀察》，頁 3。

⁴ 毛慶：〈蘇慧霜著《宋代騷雅詞論》〉，《宋代文學研究年鑒》(武漢：武漢出版社，2013 年)，頁 347。

有價值的學術著作不僅是其結論對學術的貢獻，更是它解決問題的方法本身給人們帶來的啟示。故撰文從蘇慧霜楚辭研究的方法入手，探討她的楚辭研究成果，並分析其研究思路與風格，以期更好地揭示楚辭研究的規律，以嘉惠學林。

二、跨越學科，契合通融

正如周建忠先生所言，鳥瞰楚辭研究古今大勢，孤立地「純研究」幾乎是不存在的，涉及到各方面知識是楚辭本身的特點，治騷也必須具有這方面的素養⁵。由於各人的學習、興趣、經歷、職業不同，每位學者擅長的學科知識也各有不同，所以其成果呈現的學術面貌也各不相同。蘇慧霜在研究過程中綜合運用音樂學、考古學、訓詁學、語言學等諸多學科方法，尤以音樂學方法為其特色。

中國詩歌文學的發展，向來與音樂密切聯繫。《詩經》與屈賦皆是音樂文學。孔子云：「歌詩三百」，可見其音樂性。而屈原〈九歌〉源於祭祀組曲，音樂自不可少。蘇慧霜就二《南》與屈賦中出現的樂器加以考察，發現其中很多樂器是二者所共有的，例如琴、瑟、鐘、鼓等。〈九歌〉的歌舞樂器，除了有傳統的編鐘與建鼓，還有竽、篪等樂器，這些品目繁多的樂器，顯示出當時南方歌舞樂風的盛況。

蘇慧霜引據 1978 年湖北隨縣擂鼓墩發掘的戰國早期的曾侯乙墓成果，顯示出土文物中有許多樂器與中原樂器相同，又根據曾侯乙墓的青銅器銘文與《國語·周語下》記載的律名有 5 個相同之處，而墓主曾侯乙事姬姓，推出曾律源於周律，而曾國又是楚國的附屬，因此得出「楚律毫無疑問是受周律影響」的結論⁶。

蘇慧霜還善於利用考古學界的成果。如對〈抽思〉「望北山而流涕兮，臨流水而太息」中「北山」地理位置的探討，她以 1973 年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帛書《相馬經》的記載，作為確定「北山」地理位置的主證，輔之以《尚書》、《左傳》、《史記》等古籍的記載，從而證明北山又稱作南山，位於南郡、南陽之間。⁷蘇氏以考古成果作為旁證，並徵引古籍，體現出「雙向互證，言必有據」的治學態度。

⁵ 周建忠：《當代楚辭研究論綱》（武漢：湖北教育出版社，1992 年），頁 348。

⁶ 蘇慧霜：《二南與屈賦》（台北：文津出版社，2009 年），頁 94。

⁷ 蘇慧霜：《二南與屈賦》，頁 69。

訓詁學是溝通古今語義的橋樑。蘇慧霜則以訓詁學作為常用的治學方法，並能時有新見。屈原作品篇末有「亂曰」，王逸《楚辭章句》所云：「亂，理也，所以發理詞指，總撮其要也。」王逸認為「亂」即「治、理」，有整理綜合，總理其要的意思。歷代學者對「亂」的解釋多持「治」、「亂」兩義。但是，這樣的釋義，無法解釋二《南》作品如「關雎之亂」。蘇慧霜轉變思路，從音樂學的角度對「亂」進行探究。「亂」作為樂節之名，有「曲終」、「樂終」、「尾聲」之意。從音樂學上解釋，「亂」為樂節的專有名詞，是樂歌的卒章。她通過多視角的探析，最終求得了屈賦「亂辭」的釋義：「所謂『亂』，是歌曲樂章常煞尾聲方法，也是樂曲的高潮，有點類似今日西方樂理中卡農(Canon)手法。」⁸訓詁學與音樂學交叉運用，相輔相成，為蘇慧霜的楚辭研究添上了濃墨重彩的一筆。

不管從哪個角度進行楚辭研究，都必須先從文字資料上去偽存真，剖磨本色。如果沒有語言文字上的深入研究，那麼一些規律性的東西就不能被發現，一些重要的論點也就不會產生。作為楚辭特色之一的「兮」字，蘇慧霜根據它所在位置的不同，將騷體分為三種句式：

1.離騷體或懷沙體，主要特徵為兩句一韻，上句末為「兮」。如〈離騷〉首段：「帝高陽之苗裔兮，朕皇考曰伯庸。」其中雖有六兮六，五兮五、七兮六等句式變化，但以六兮六為主要句式。2.九歌體，句中用「兮」。主要體現在〈九歌〉篇章中，譬如：「鳥次兮屋上，水周兮堂下」。3.橘頌體，下句句末用「兮」。如〈橘頌〉：「深固難徙，更壹志兮。」這三種基本句式，因為字數的不同，呈現出豐富的變化，有四言、五言、六言、七言、八言等。

蘇氏對楚辭「兮」字句式的歸納看似老生常談，其實不然。她以此為基礎，進一步列舉了屈宋以降歷朝歷代「兮」字的使用情況，揭示出楚辭句式對後世詩、詞的最大貢獻在於提供了奇言句式，尤以三、七言為甚。以〈山鬼〉為例：

若有人兮山之阿，被薜荔兮帶女蘿。
既含睇兮又宜笑，子慕予兮善窈窕。

七言的〈山鬼〉到了漢樂府楚辭鈔〈今有人〉則去「兮」字變成三言：

今有人，山之阿，被服薜荔帶女蘿。
既含睇，又宜笑，子戀慕予善窈窕。

⁸ 蘇慧霜：《二南與屈賦》，頁104。

從〈山鬼〉到〈今有人〉，「兮」字分別被省略或被實字替換，一字之差即可看出「兮」字在騷體衍變中起到的關鍵作用。對此，蘇慧霜並不僅僅滿足於從語言學的角度揭示「兮」字的流變，她再一次從音樂學角度立論，「『兮』字的彈性應用，奇言句的錯雜使用別於四言與六言句的整齊規律，長短參差的語氣，長於抒發幽婉纏綿的情緒，特別適合於音樂節奏變化的表述，更具句法變化的靈活，從而造成一唱三歎的流轉之美。」⁹這個觀點繼承並發展了朱熹的學說。朱熹認為：「古樂府只是詩，中間卻添許多泛聲，後來人怕失了那泛聲，逐一添個實字，遂成長短句--今曲子(詞)便是。」¹⁰蘇慧霜再次肯定了「兮」字的聲唱作用，並指出了「兮」字容易受音樂節奏影響的特點。就「『兮』字騷體衍變」這個論題來看，蘇氏從音樂學角度的詮釋較之語言學解釋更全面一些。由此可見，蘇慧霜在楚辭研究中不拘泥於單一的研究視角，善於打破學科之間的隔閡，達到了融會貫通的境界。

三、宏微並用，以意逆志

學術研究，既離不開微觀的細節探索，也離不開宏觀的整體把握，二者互為表裏，相輔相成。沒有微觀的細節探索，宏觀的整體把握就如同空中樓閣，沒有堅實的基礎；沒有宏觀的整體把握，微觀的細節探索就是「一盤散沙」，缺乏系統的觀照。

蘇慧霜曾對屈原作品的稱名作過一番詳細地考辨，列舉出不同時代不同作家對屈原作品的不同稱名，再結合屈原、宋玉對自己作品的稱名，最終傾向於稱屈原作品為「騷體」。她認為現在研究「騷體」應當跳脫狹隘的「楚地文學」的觀念格局，凡是以「兮」字為基本形式構句的作品，舉凡民歌、樂府、辭賦、詩、文等具備騷體形式的文學作品均應納入研究範圍。¹¹她的研究視野從楚辭延伸到「騷體」文學，但是她的「騷體」研究始終圍繞屈宋作品為中心開展，她探討了屈宋作品的三個意象：美人意象、香草意象、禽鳥意象，並將屈宋作品的題材歸納為五點：神女題材、悲秋題材、遊仙題材、不遇題材、紀行題材，以這些意象及題材為框架，對具有代表性的部分屈原作品進行重點闡釋，並進一步探討了騷體的發展、衍變、文學影響。可以看到，蘇慧霜的「騷體」研究不僅是尋求更深層次的文化解讀，更是帶着「強化『騷體』文學概念」這一目的，將「騷體」視為一種文學類型進行研究的。

⁹ 蘇慧霜：《宋代騷雅詞論》（台北：文津出版社，2011年），頁36。

¹⁰ 唐圭璋：《詞話叢編》（台北：廣文書局，1967年），頁3780。

¹¹ 蘇慧霜：《騷體的發展與演變--從漢到唐的觀察》，頁5。

蘇慧霜對楚辭本體作了深入的分析 and 細膩的探究，她將屈原詩學歸納為：一、叩寂寞而甘寂寞的生命美學。二、以情悟道的抒情精神。又將屈原「隱喻情結」分為八種，即「自我情結」、「自負情結」、「自惜情結」、「保真情結」、「自戀情結」、「不遇情結」、「自覺情結」、「自傷情結」。¹²在討論屈原「自惜」情結時，她認為屈原是明白正言危身的道理的，但「正言危身不是不愛惜自己的身體，相反的，正是因為愛惜，所以才不願為富貴而捨身」¹³；對於屈原「自戀」情結，她認為屈原畢生希望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，但因為有人格潔癖，不願意為了實現理想而犧牲自己的人格。可見，蘇慧霜對屈原的認識，已經突破了前人簡單的歸納：寧折不彎，不願同流合污。她將屈原面對嚴峻事實時自身的取捨剖析出來，即「人格>理想>仕途>身體」，顯示出她對屈原的認識與理解達到了更高的層次。劉熙載《遊藝約言》云：「文，心學也。」¹⁴蘇慧霜對屈原作品發微細究，既知人論世，又以意逆志，如同身歷其世，面接其人，與屈原進行心靈對話，從而探知屈原情志，達到釋疑解惑之目的。

蘇慧霜還充分認識到宋玉作品的文學價值。目前學術界對宋玉的文學地位褒貶不一，對宋玉文學價值的研究尚未形成氣候，但是蘇慧霜將宋玉的文學史地位提升到「屈宋並舉」的高度。她認為儘管宋玉因「曲諫」而為人詬病，但實乃形勢所逼，又有屈原作為前車之鑒，因此是可以理解的。《楚騷魂--屈宋辭賦的抒情精神與生命美學》下編「宋玉詩心」與上編「屈原詩學」遙相呼應，如此編排頗有為宋玉正名的意味。蘇氏傾向於將〈招魂〉的作者定為宋玉，認為該文是戰國時期「禮崩樂壞」社會背景下楚國知識分子對文化與生命沉思的一種表現，「〈招魂〉顯示一幅永恆對照的生命景觀：『死→生→永生』包含最深刻的文化精神的意義」¹⁵。從複雜的作品分析中化繁為簡、準確歸納，體現出她的高度的概括能力與嚴謹的治學素養。

蘇慧霜還注意到劉勰《文心雕龍》提出的宋玉「始造對問」之說，肯定宋玉對賦體結構的創新。對於宋玉賦中出現「下里」，她根據《說苑》曾稱楚人孫叔敖為「下里之士」推斷「下里」是對庶民百姓或窮巷閭弄的稱謂；又

¹² 蘇慧霜：《楚騷魂--屈宋辭賦的抒情精神與生命美學》(台北：文津出版社，2015年)，頁36。

¹³ 蘇慧霜：《楚騷魂--屈宋辭賦的抒情精神與生命美學》，頁47。

¹⁴ 劉熙載：《劉熙載文集》(南京：江蘇古籍出版社，2001年)，頁751。

¹⁵ 蘇慧霜：《楚騷魂--屈宋辭賦的抒情精神與生命美學》，頁198。

根據巴人曾經被楚人征服推斷巴人的歌舞應被視為俚俗歌舞之樂；關於「陽阿」之曲，根據宋代羅願《爾雅翼》：「陽阿者，采菱之曲」，可知〈陽阿〉與〈采菱〉同是流行於民間的歌謠；至於〈陽春〉、〈白雪〉，則是意境高雅之樂。蘇慧霜分析了「下里巴人」、「陽阿蠶露」以及「陽春白雪」三種不同風格的樂曲，強調三者境界與格調之不同。她還逐層分析了宋玉對答楚王時使用的答辯技巧和說辭藝術：面對楚襄王的探測與責難，宋玉沒有立刻加以否認，他謙卑地在楚王面前連聲稱是，巧妙地迎合楚王的盤詰；繼而順應着楚襄王的問語而下，既不否認，也不急於辯白，只是接着不疾不徐地針對襄王的質疑展開精彩的對話辯白。他先認真地向襄王提出請求免責權「願大王寬其罪，使得畢其辭」；有了護身符，或以為他要接着向楚襄王解釋「不譽之遺行」，可他又執拗地不正面替自己辯解，而是虛構了一個郢中客的故事。這「郢中客」的身份，亦虛亦實，亦實亦虛，透過「客」的引導，而導出宋玉對境界的批判。蘇氏結合作品中的對白有條有理地分析宋玉的答辯方式，展現了宋玉驚人的說辭能力和善變的技巧，從而再次肯定了宋玉「藻溢於辭，辯盈乎氣」的曲諫之才。蘇慧霜立足本體，獨立嚴謹，求真務實，鞭辟入裏的研究態度從中可見一斑。

四、追源溯流，辨異析同

章學誠《文史通義·詩話》：「論詩論文，而知溯流別，則可以探源經籍，而進窺天地之純，古人之大體矣。」¹⁶蘇慧霜的詩文研究採用順流而下的方式，從《詩經》開始，進而至屈賦、宋玉賦，進而至騷體從漢至唐的發展衍變，進而至宋代的騷雅詞，通過探尋、分析、歸納它們之間的相同點與不同點，揭示文學發展的歷程與規律。正如周建忠先生所言：「讀先秦典籍就是從源頭開始，再讀唐宋以後的書就是順流而下。蓄積既久，自然融會貫通，舉一反三，省力多多」¹⁷，縱觀蘇慧霜的學術研究，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出從上到下的發展脈絡，甚至可以推測宋代之後的騷體文學有可能是她進一步研究的方向。蘇氏的研究，在生產新知的同進，還開闢了一條新的治學門徑。

《詩經》通常被認為是中國第一部現實主義詩歌總集，《楚辭》則是第一

¹⁶ 章學誠著，葉瑛校注：《文史通義校注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5年），頁559。

¹⁷ 周建忠：〈關於楚辭研究的幾點看法〉，《中州學刊》（鄭州：中州學刊雜誌社，2015年），頁141。

部浪漫主義詩歌總集。蘇慧霜則認為在中國的古代文藝理論中是沒有「現實主義」與「浪漫主義」這類名詞的，有的只是體現這類創作方法的傾向，將《詩經》和楚辭貼上「現實」與「浪漫」標籤，並不能全面概括《詩經》與《楚辭》的風格特色。象徵現實主義的《詩經》中存在着浪漫主義手法，如《周南·卷耳》的第一章寫實，後三章想象，通過想象體現出了浪漫主義風格。至於屈賦，在浪漫抒情中結合了玄想、神話、傳說、巫術等元素，區別於《詩經》質樸的抒情風格，在統一之中有着不同。楚辭中亦存在着現實主義手法，譬如屈原於〈離騷〉開篇的自我介紹、對國家危機的認識、對黨人貪婪的刻畫等都體現出屈原立足於現實的筆調。

與此同時，蘇慧霜結合文本分析與眾家評述，認為屈賦是在個人經歷的基礎上以第一人稱寫作的，是透過理想與現實交織的經歷傳述，這樣的個人寫實作品與《詩經》透過集體創作呈現的地方寫實文學又有着極大差異。這個觀點再一次印證了她對立統一的治騷態度，她的分析立足於文本而能超越文本，參考評述卻不拘泥於評述，辯證地探討屈賦與《詩經》整體風格的異同，異中求同，同中求異，所以能切中肯綮、入木三分。

在本體研究的基礎上，蘇慧霜還注意到宋代詞壇上的「騷雅詞風」。她對「騷雅詞」產生的時代文化背景，詞評理論和詞家作品作一一考察與探究，發掘騷雅詞在詞史發展中具有的特殊地位。她認為，「騷雅」之名起於唐人詩作之中，經北宋詞家毛滂、賀鑄等以「幽索如屈宋」的騷雅精神作詞，在南宋中後期發展成一個詞學流風，姜夔、辛棄疾、吳文英、張炎、周密、王沂孫等詞人皆是此詞派之大家。她明確指出，「騷雅」作為一個詞學的獨特概念，顯然繼承楚騷的精神，並引據清人沈祥龍《論詞隨筆》的論斷：「詞者，詩之餘，當發乎情，止乎禮義，《國風》好色而不淫，《小雅》怨悱而不亂，〈離騷〉之旨，即詞旨也」¹⁸。蘇慧霜從中國古代文學理論中找到了詩、騷、詞創作宗旨一脈相承的理論聯系，又用大量的作家作品加以證明。例如她認為東坡詞之靈魂是「騷雅」精神，並從三個層面論證：一是對屈原人品與文品的推崇，東坡以為「吾文終身企慕而不能及萬一者，惟屈子一人耳」；二是東坡將詞「變俗為雅」，是以「騷雅」精神完成詞風改造工作；三是東坡詞或託意靈均，或

¹⁸ 唐圭璋：《詞話叢編》（台北：廣文書局，1967年），頁4061。

化用楚辭，而能變化出新，可謂開騷雅詞之先驅。蘇慧霜論述過程中既分析東坡詞作，又參考古人詞論，抽絲剝繭、層層推進，逐漸揭示作品的文學特徵。由是觀之，蘇慧霜善於結合作家的時代背景探究作品風格的形成原因，分析具體作品提煉觀點，並輔以古代文論家對作家、作品、流派的評論，在敘議並進中給人新的理解與認識。

尤其值得一提的是，蘇慧霜在研究三言詩起源時，對於《文心雕龍》「三言興於虞時，元首之詩是也」的觀點提出不同看法。劉勰之所以認為〈元首之詩〉是三言詩，是因為〈元首之詩〉中的詩句若是去掉語尾助詞「哉」字便成了三言詩句。蘇慧霜認為：「如果這些去掉語助詞的四言句可以視為三言詩的話，先秦流傳的騷體詩歌，像是〈塗山女歌〉、〈卿雲歌〉、〈夏人歌〉等等，去掉『兮』字也是三言詩。」¹⁹她從文化原典的分析出發，能夠舉一反三，言之有據，其結論是令人信服的，同時也體現出她不迷信權威經典、肯定與批判並舉的理性的研究態度。

五、結語

蘇慧霜的研究室裡，懸掛著王錫圭先生書寫的隸書條幅「奇文窺楚騷，妙理翫蒙莊」，昭示著室主的治學旨趣。劉勰《辨騷》以為習楚辭者：「才高者苑其鴻裁，中巧者獵其豔詞，吟諷者銜其山川，童蒙者拾其香草。」蘇慧霜在楚辭研究上，不僅成果豐碩，而且境界高遠，能在總結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，作出自己獨樹一幟的結論。她的治騷成就有目共睹，其成果涵蓋楚辭淵源研究、本體研究、衍變影響研究，三者相輔相成，互為表裏，構成相互聯繫、相互補充的蘇氏楚辭學體系。蘇慧霜以深邃的歷史眼光，自覺地把楚辭放在中國文學發展的歷史長河中加以關照和評判，彰顯楚辭對前代文學的接受與拓新，以及後代文人對楚辭的繼承與發展。綜觀蘇慧霜的楚辭學論著，可以發現她一方面具有「史」的縱向意識，對諸多觀點的源流嬗變十分熟悉，不論是探討楚辭複雜的上源，還是在梳理「騷體」文學歷史發展脈絡時總能做到材料充分、考察全面、論述詳實，為更深層次的研究打下良好的基礎。另一方面，蘇慧霜在楚辭研究的過程中還具有突出的整體性，她力求

¹⁹ 蘇慧霜：《騷體的發展與演變--從漢到唐的觀察》，頁 299。

使自己的宏觀整體把握和微觀細節探索完美結合，以形成一個完整的楚辭研究系統。蘇慧霜的楚辭研究從來都不是孤立、單一地進行的，她總是以全面的、辯證的觀點看問題，得出經得起推敲的結論，並善於與其它學科方法相配合，體現出系統性、開闊性、綜合性的特點。蘇慧霜或參考，或引證了數百種古代典籍、出土文獻、學術論著，在古今學術資源中姿意馳騁，縱橫捭闔，顯示出博覽群書的優秀專業素養。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。蘇慧霜的楚辭研究都是建立在扎實的文獻學基礎上的，她的碩士、博士論文皆與楚辭有關，在取得博士學位後又陸續發表了幾十篇楚辭學論文。蘇慧霜的論文善於以點帶面、由小見大，譬如在〈從郭茂倩《樂府詩集》初探漢唐樂府與楚辭的關係〉一文中²⁰，蘇慧霜巧妙地借助《樂府詩集》中保留楚聲、楚調的十類歌辭作為依據，並從「騷體形式」、「楚聲楚調」、「取題名篇」、「取材〈九歌〉」四個方面對楚辭與樂府之間的關係進行了深入探討，文心縝密、脈絡清晰、層次分明、見解獨到，實乃蘇氏治騷文章之縮影。與此同時，她還關注到身邊的楚辭文化，她的〈千年預言--記一場屈原的遠遊〉²¹記載了台灣彰化市寶部里有個屈家村，是台灣唯一一個屈原後裔聚集的村莊，居住著三十多戶、二百多位屈原後裔，至今仍祀奉屈原神像。由此可見她治騷日久，浸淫其中，目光所及之處皆能注意到楚文化之光彩。焚膏繼晷、厚積薄發，正是由於勤勤懇懇、扎扎實實的文學積累，蘇慧霜才取得了一系列的楚辭研究成就。除此之外，蘇慧霜還涉及楚辭學之外的文學研究，出版了《阿里山詩集》²²、《阿里山文學誌》²³、《華人社會與文化》²⁴、《文學與人生》²⁵等書。這些研究活動進一步豐富她的文學閱歷，推動她的研究事業向更寬廣、更高遠的方向發展。

²⁰ 蘇慧霜：〈從郭茂倩《樂府詩集》初探漢唐樂府與楚辭的關係〉，《雲夢學刊》（岳陽：湖南理工學院期刊社，2011年第四期），頁35-42。

²¹ 蘇慧霜：〈千年預言--記一場屈原的遠遊〉，《閩台文化交流》（漳州：漳州師範學院閩台文化研究所，2012年第三期），頁156-159。

²² 蘇慧霜：《森林詩語-阿里山詩集》（台灣：林務局嘉義林區管理處，2013年5月）。

²³ 蘇慧霜：《阿里山文學誌》（台灣：林務局嘉義林區管理處，2013年5月）。

²⁴ 蘇慧霜：《華人社會與文化》（台北：新學林出版社，2014年4月）。

²⁵ 蘇慧霜：《文學與人生》（台北：新學林出版社，2006年9月）。